

编者按:为了加强中日学术交流,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刊发11篇日本学界的相关文章,这些文章全部是2013年9月13—17日在重庆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次会议”的参会论文。感谢这次会议的日本组织方暨日本日中关系史研究会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为了尊重作者,本刊除了技术编辑、技术处理之外,不做任何改动。文中有些行文、说法与中国不同,请读者体察。

日中战争初期 上海租界经济与重庆国民政府

今井就稔

前 言

日中战争爆发后,日军控制了上海,但众所周知,上海租界(公共租界的一部分以及法租界)仍然保持着独立状态。大部分上海的中国企业家拒绝去大后方,在租界之内避难,并开展企业经营活动。他们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为租界带来了战时的经济繁荣,这种特殊的“孤岛繁荣”现象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租界的畸形经济繁荣大概开始于1938年下半年,此时战局转为持久战,日中两国进入战时体制,日本方面的政策重点由军事侵略转为对沦陷区的“经营”,其中,“华中占领地”的上海政策是重要的问题之一。

但是上海租界涉及很复杂的国际关系,连日军也不可以侵犯,这种情况对日本的占领政策有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重庆国民政府也开始经济建设,但大后方经济本来比沿海地区落后,很多物资不得不依靠其他地区,其中上海是非常重要的地区。总之,对日中两国来说,尽管上海租界很重要,但他们都不可以直接干涉其经济。

本文探讨日中两国对上海租界经济的政策,即两国如何利用上海租界以加强战时体制,特别关注重庆国民政府的物资统制政策与上海租界的关系。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有两点问题值得商榷。

第一,日中战争时期的中国沦陷区与大后方的经济关系。虽然对重庆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大后方社会以及以上海史研究为代表的沦陷区社会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但是关于两个地区之间的关系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特别是不少上海史研究只局限于上海地区之内。^①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上海在战时中国的经济地位究竟如何。本文试图从上海以外的视角观察上海租界及其地位。

^① 日本国内的代表研究成果是:高綱博文編『戦時上海』、研文出版、2005年。

第二,重庆国民政府如何筹措物资以进行抗战。这方面也有不少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郑会欣的研究。^①他特别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重庆国民政府的贸易政策进行了分析,指出重庆国民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经历了从调整(政府对既存的民间贸易路径加以调控)到统制(所有收购销售由国家管理)的过程。但以上研究并未涉及上海经济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上海与重庆两地,因长江水运而紧密相关。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和国民政府开始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后,上海因其独特处境而呈现出了一时的经济繁荣,对此国民政府采取了何种应对之策,值得关注。

本文主要以《禁运资敌运沪审核办法》及其制定过程为线索,探讨以上两点问题。该办法于1939年3月由国民政府制定,改变不允许把物资运到沦陷区的原则,明文规定了物资运出大后方到上海租界的具体方法。该办法是理解国民政府的上海租界政策很合适的研究对象。另外,本文还将国民政府的上海政策与日本方面的租界政策加以比较,以进一步了解当时上海经济在战时中国的地位。

一、日本占领地与上海租界

首先,作为参考,下文对日本方面对上海租界的态度作一简述。

日本对“华中占领地”的经济统制没有华北普及。日军在华中的控制也比华北薄弱,只能控制“点与线”(主要城市以及城际铁路、公路)。另外,由于法币已经普及,也很难在该地区“改革”货币制度,控制金融机构。上海是“华中占领地”最重要的城市,其经济模式本来就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自由型经济,再加上战争开始后上海租界仍然保持了独立状态,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未被切断,因此,日本难以在该地推行经济统制政策。

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不仅中国企业,其实连日本企业的经营活动也要依靠租界经济。例如棉纺织业,日本在华纺主要依靠外国棉花(见表1),他们经由租界进口棉花,棉纱布的销售也与租界内中国企业以及国内、国外市场密切相关,他们实际上无法脱离租界开展企业经营活动。^②另外,他们的这种经济活动大部分使用法币,这使情况更为复杂。^③

这样的租界经济情况对日本支配力产生何种影响,日方各种机构之内没有统一见解。以下是陆军的想法:

租界(包括香港)还在重庆政府的影响下,扰乱占领地区的治安,外国势力也利用租界支援蒋介石,所以作为“扰乱治安的策动据点”,对日方带来很坏的影响,而且租界之内不遵守我

^① 郑会欣:《复兴商业公司的成立与初期经营活动》,台北《近代中国》第138期,2000年10月;郑会欣:《从调整到统制——试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外贸政策的演变》,台北《近代中国》第148期,2002年4月;郑会欣:《争取物资与统制贸易——论抗战后期重庆国民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12期,2003年12月;郑会欣:《重慶国民政府の貿易統制政策——抗日戰爭後期における貿易委員會の活動を例として》,石島紀之·久保亨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郑会欣:《试析战时贸易统制实施的阶段及其特点》,《民国档案》2005年第3期;郑会欣:《经济统制与国营贸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活动》,《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② “虽然上海在华纺生产的棉纱有一部分出口到南洋方面,但大部分在中国国内销售,特别是在内地的非占领地销售。棉纱布商人把日本工厂生产的棉花运到租界之内,把它们在中国的染色厂或织布厂加工,以后就不知运去哪里了”(名和统一「戦時支那紡績業の動態と其の問題」、大日本紡績聯合會編「東亞共榮圈と纖維産業」、文理書院、1941年、181頁)。

^③ “用法币收购棉花、发放工资、收取贷款,也就是说,日资工厂的经营以法币为基础。这无疑扩大了法币的流通范围,维持了其价值与信用。但另一方面,日资工厂使用法币也对法币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巨额法币集中于国民政府无法控制的上海,不仅存在流通上的风险,也有益于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名和统一「戦時支那紡績業の動態と其の問題」、大日本紡績聯合會編「東亞共榮圈と纖維産業」、181—182頁)。

方决定的金融政策、交易统制,不赞同帝国的经济措施。租界的“敌对性”对我方有很大的影响。^①

表1 上海在华纺利用棉花情形

单位:担

年	华北棉花	华中棉花	中国棉花合计	进口棉花合计	进口棉花比率
1935	965410	680453	1645863	641996	28.1%
1936	1175259	695045	1870304	423498	18.5%
1937	1036496	527889	1564385	152833	9.0%
1938	974356	545383	1519739	221103	12.7%
1939	387730	682127	1069857	2128255	66.5%
1940	42508	716541	759049	2104104	73.4%
1941	没有记录	860550	860550	1182782	57.8%

资料来源:1935—1938年:多谷泰三「事变後の支那における紡績業」、大日本紡績聯合会編「東亞共栄圏と纖維産業」、250頁。

1939—1941年:東亞研究所編「支那占領地経済の發展」、龍溪書舎、1978年(原刊本1944年)、241頁。

说明:1937年以后的数字包括由在华纺“委任经营”的华商纱厂。

但在兴亚院资料中,可以看到对租界的另一种看法:

(一)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上海租界应该收回,但决定其时机的时候,应该考虑国际时局以及帝国的国防能力。

(二)考虑到上海公共租界在国际经济上的地位,我帝国也应该使租界成为获得资源的据点,暂时保持租界的国际性。^②

总之,据高纲博文的解释,日方对租界经济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方面,有的人强调租界的各种弊病,试图收回租界,统制其经济以便实施占领地之内统一经济的工作(“强硬派”)。但另一方面,有些人考虑到上海租界的经济地位,认为日本也应该保持其国际性,寻找在其体制下,获得各种物资资源的机会(“国际派”)。据高纲论文,“强硬派”以日军、上海日侨之杂业层为主;“国际派”以兴亚院、外务省、上海日侨之大企业、银行等有关人员为主。^③

通过上述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到上海租界经济对日本是很复杂的问题。那么,对于重庆国民政府,上海租界是什么地位?

二、重庆国民政府与上海租界——制定《禁运资敌运沪审核办法》

尽管日军占领江南重要城市,封锁长江航运,管理物资交易,但是上海与大后方仍然保持各种交易。例如,1938年,自上海租界运往后方的交易金额占上海的国内运出总额之63.5%,自后

① 大本營陸軍部・大本營海軍部「支那事变处理要綱」に関する所要事項の説明に就て、1940年11月、白井勝美・稲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9 日中戦争2」、みすず書房、1964年、608頁。

②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 日中戦争」第4冊、六一書房、2011年、2791頁。

③ 高綱博文「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上海租界問題』」、「『國際都市』上海のなかの日本人」、研文出版、2009年。

方运到上海租界的金额占上海国内运入总额的43.5%。^①还有研究指出1938年到1941年上海国内贸易中,自上海运出之60%、运入到上海之50%左右是与大后方的贸易。^②另外,虽然上海与香港之间的贸易在统计上当为国际贸易,但实际上,大部分物资都经过香港运到大后方,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这条运输线对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③

重庆国民政府也期待孤岛上海的物资,各种机构在上海收购物资,建立国货奖励制度、商标登录制度等,希望以此保持对上海工商业的影响力。^④但是,尽管租界基本上是日方权力之外的“独立”地区,可是其周围都在日本占领地体制之下,而且由于重庆与上海之间距离较远,租界工部局的活动也容易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因此国民政府很难控制和干涉上海的租界经济。这种情况也使得上海企业家可以进行自由的经济活动。由此可见,上海租界经济对重庆国民政府也是很复杂的问题。一方面,重庆舆论对上海企业家的经营活动大肆批评^⑤,但另一方面,在他们的活动下保持的上海与大后方之间的经济联系对大后方建设又非常重要,因此不能忽视战时上海租界经济的复杂性。租界经济所具有的多面性,使得国民政府也无法简单地评价上海租界经济对抗战的意义。

(一)《禁运资敌物品条例》与《查禁敌货条例》

1938年10月底,国民政府为准备长期抗战,开始实行统制政策。其中为了管理大后方与沦陷区之间的物资交易,1938年10月28日,公布了《禁运资敌物品条例》(禁止把物资运到沦陷区)以及《查禁敌货条例》(禁止把敌方物资运到我方)。《禁运资敌物品条例》引起了激烈的论争。根据该条例,1938年12月10日,军需、生活物资等54种物品被禁止交易。12月31日,“满洲国”及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江苏、浙江、福建省内城市被指定为禁止运出的地区,上海也在其中,条例中没有与租界相关的规定,也就是说租界也属于禁运地区。

(二)上海商人反对《禁运资敌物品条例》及《禁运资敌运沪审核办法》的制定

国民政府制定的《禁运资敌物品条例》遭到了上海商人的反对。即使在租界之内的中国工厂,他们大部分原料都依靠来自外国或沦陷区的物资,同时也需要把产品运出上海,所以如果政府禁止交易,他们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禁运资敌物品条例》公布后,上海市的商人纷纷向政府要求批准跟上海租界交易。例如,上海市商会接受生漆同业公会的要求,替他们向国民政府提出:“上海市商会以沪市商业,向集中于租界区域,自国军西撤后,在南市闸北之商业,可以设法搬迁者,亦均前后移至两租界安全区营业,生漆为居民日用器具涂饰所必需,亦非资日物品。”^⑥此外,上海商界领袖虞洽卿也代表棉纺织业界要求政府批准把浙江省棉花运到上海。^⑦

表2是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整理的跟这一时期上海租界交易相关的申请。由表2可见,《禁运资敌物品条例》公布不到4个月,经济部就收到了大量申请。

① 张赛群:《上海“孤岛”贸易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57—58页。

② 参见袁燮铭《上海孤岛与大后方贸易》,《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3期。

③ 参见王子建《“孤岛”时期的民族棉纺工业》,《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1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张晚辉:《论广州沦陷后香港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和作用》,《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④ 吴景平:《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1—95页。

⑤ 《如何吸收上海过剩资金建设后方》,重庆《中央日报》,1939年8月19、20日。中共杂志上也有批判:“我们并不是无视上海的民族工业,不过我们深深感觉到有一批民族资本家,不愿投资后方,将工厂迁移内地,来支持抗战建国,一味苟安上海租界让旁人在流血,自己去发财,这事无论如何讲不过去的”(石西民:《怎样估计上海经济?》,《群众》第4卷第15期,1940年5月,第424页)。

⑥ 《各业纷请土货运沪财部考虑补救办法》,《中美日报》,1939年2月8日。

⑦ 《虞洽卿乞准浙棉运沪》,《申报》,1939年2月4日。

表2 经济部收到的申请书(至1939年2月4日为止)

提出申请书的机构(包括个人)	要求运往上海的物资名称
军事委员会	—
福建省闽侯县机器锯木业公会	木材
福建闽江上游采办杉木业公会	木材
木嘉机锯木板运销业公会	木材、箱板
上海市商会	木炭
宁绍纸类运销处	纸类
鄞县纸商高予□等	纸类
宁波纸商张蔬	纸类
宁绍纸类运销处→财政部	纸类
宁绍纸类运销处→行政院秘书处	纸类
鄞县茶商姜伽良等	茶
福建省政府	茶、木材、纸类
福建省政府→财政部	茶、木材、纸类
福建省闽侯县商会等	茶、木材、纸类、竹
福州纸业公会	茶、木材、纸类、竹
福建省闽侯县→财政部	茶、木材、纸类、竹
福建省政府建设厅徐严两厅长	茶、木材、纸类
宁波市商会→浙江海关→财政部	棉花、棉制品、茶、纸类、蛋制品
宁波市商会	茶、棉花、纸类、蛋类
华商纱厂联合会	棉花
宁绍棉花运销处虞和德	棉花
上海市棉花棉业公会	棉花
浙江省政府	蛋、竹、木炭等
宁波商会周大烈	棉花、棉纱、茶、蛋、纸类

资料来源:《禁运资敌物品运沪运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4/28500。日期不明(据前后史料,估计为1939年2月上旬)。

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部也不得不重新考虑交易物资的范围,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在抗战的情况下,需要重新看待上海租界经济的位置。

1939年2月11日,经济部召开“讨论禁运资敌物品会议”,除了经济部的商业司、工业司、矿业司、农本局、农林司之外,军事部、外交部、财政部的有关人员也参加了会议,可见如何应对上海租界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部的问题。由于史料的关系,我们无法了解会议的具体经过,但可知的是该会议终于认可了把禁止交易的物品运到上海租界。^①此事在《禁运资敌运沪审核办法》中有了明文规定。1939年3月13日,国民政府试行《禁运资敌运沪审核办法》,规定:资敌物资如果经过必要的手续,可以运到上海租界。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承认,上海租界之内有从日本权力“独立”的工厂,不应该把他们制造的物品一概视为资敌物资。

^① 《讨论禁运资敌物品会议记录》(1939年2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4/28500。

此后,国民政府开始制定运出时的更具体的方案,比如许可物资的种类和所需手续等。1939年3月20日,经济部召开“商讨禁运资敌物品运沪证明书核定办法及游击战区内禁运资敌物品收买救济会议”,该会议确定了具体物资及其负责机关。^①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野禽、羽毛、鲜冻肉、肠衣、蛋制品、桐油、生漆、茶、木材、竹(只限于建筑用)、生丝、柞蚕丝

农本局——棉花、棉制品

工矿调整处——染料、纸(只限于报纸用)、煤炭、瓷土

资源委员会——明矾、石膏

查核证明书的地点——宁波、温州、福州、汕头、重庆、昆明、龙州

(三) 交易路线的变化与《禁运资敌运沪审核办法》

制定《禁运资敌物品条例》之后只过了半年,国民政府就改变了对上海租界的姿态,承认上海租界之特殊地位。商人、地方政府反对该条例是这种改变的原因之一。但我们不应该只关注国民政府对商人、地方政府以及沦陷区民众的考虑,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国民政府是如何改变方针的。实际上,为了继续抗战,确实有人提倡考虑沦陷区民众生活^②,但如果是那样,要考虑的对象不应只有上海,还应该考虑全体沦陷区民众。从另一方面说,在抗战的社会动荡之下,政府单方面地制定《禁运资敌物品条例》、《查禁敌货条例》、《禁运资敌运沪审核办法》等各种法规,我们很难分析其在社会的基层到底有什么实际效力。

1. 物资的特征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一步分析制定《禁运资敌运沪审核办法》的背景,需要探讨在表2提及的各种物资有什么特点。我们利用郑友揆、韩启桐编《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分析运出运入统计,探讨各物资的特点。该统计不包括上面谈到的所有物资项目,而且该统计不包括陆路、铁路运输,也不可能了解走私情况。^③另外,有的物资被统计的是交易金额,有的物资被统计的是交易数量。对金额数量都有的物资,本论文采用交易数量,因为战时通货膨胀很严重,即使金额多,不一定反映贸易的规模。表3反映了表2中的各种物资从何处运到上海。

2. 宁波、温州交易路线

从表3我们可以看到,福建、浙江的商人想得到政府的批准,把各种物资运到上海。其中,木材、绿茶等本来就是该地区的特产。而红茶、蛋制品等,战前不经此路线交易,抗战开始后才改变交易路线。可见,战时福建、浙江的港口变成对运出物资到上海非常重要的集散地。交易路线改变的最大原因是日军的长江封锁。日中战争开始后,除了煤炭等一部分物资以外,汉口、芜湖、重庆等长江沿岸的大城市都不再是物资运往上海的重要枢纽了。取而代之的是福州、宁波、温州等福建和浙江的港口。虽然运往上海的物资数量比战前大幅减少,但从1938年到1940年,这些港口成为对上海与大后方交易不可缺少的枢纽。

特别是宁波和温州的重要性,其实日方也有所认识。在管理中国占领地行政的中心机构兴亚院的史料当中,可以看到对这两个港口重要性的具体分析。

^① 《商讨禁运资敌物品运沪证明书核定办法及游击战区内禁运资敌物品收买救济办法会议记录》(1939年3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4/28497。

^② “战区之工商业虽已有一部分被敌人攫取,但亦有一部分仍为国人所经营,此等国资工商业,虽在敌人威胁利诱下,尚苦心支撑与敌人之经济势力相搏斗,若不分皂白,一律拒绝其货物之运入我后方,则不仅将逼使它为敌人全部所攫取,同时还会使他们走上对我政府怨怼失望的途径上去”。参见千家驹《论经济反封锁》,《理论与现实》创刊号,1938年4月,第49页。

^③ 关于抗战时期的走私问题,参见齐春风《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表3 各地输出至上海的物资

轻木材 单位:元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输出总额	比率(%)	输出总额	比率(%)	输出总额	比率(%)	输出总额	比率(%)	输出总额	比率(%)	输出总额	比率(%)			
福州	1372221	73	福州	2072077	72	福州	2972060	80	福州	3985695	89	三都澳	214937	54
温州	327608	17	温州	418485	15	温州	679587	18	温州	432235	10	温州	178679	45
广州	161390	9	广州	325609	11	宁波	35760	1	三都澳	35072	1	天津	1491	0
其他木材 单位:元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输出总额	比率(%)	输出总额	比率(%)	输出总额	比率(%)	输出总额	比率(%)	输出总额	比率(%)	输出总额	比率(%)			
广州	105880	53	广州	94147	57	福州	864184	74	福州	1866923	80	胶州	398246	55
长沙	34662	17	重庆	22490	14	温州	168002	14	温州	219703	9	温州	163394	23
福州	19466	10	天津	11423	7	宁波	63026	5	胶州	106396	5	宁波	111252	15
各种纸类 单位:元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输出总额	比率(%)	输出总额	比率(%)	输出总额	比率(%)	输出总额	比率(%)	输出总额	比率(%)	输出总额	比率(%)			
福州	938732	29	汕头	678073	29	杭州	8311367	61	宁波	12250098	74	宁波	10278519	65
汕头	759068	24	福州	497016	21	宁波	3968002	29	温州	2676764	16	温州	3064504	19
汉口	622906	20	温州	323671	14	汕头	737777	5	福州	1130769	7	天津	1220184	8
温州	425417	13	宁波	240543	10	福州	519439	4	三都澳	292709	2	三都澳	955190	6
杭州	134660	4	汉口	230566	10	广州	80074	1	汕头	155927	1	广州	325836	2
各种红茶 单位:公担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输出总量	比率(%)	输出总量	比率(%)	输出总量	比率(%)	输出总量	比率(%)	输出总量	比率(%)	输出总量	比率(%)			
汉口	47107	78	汉口	32082	75	温州	3516	65	温州	797	65	宁波	2442	41
芜湖	3894	6	芜湖	4518	11	宁波	931	17	宁波	430	35	温州	1475	25
九江	3670	6	九江	4319	10	以下略			以下无			以下略		

各种绿茶 单位:公担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输出总量	比率(%)								
杭州	37	宁波	64	宁波	70	宁波	64	宁波	68
宁波	36	汉口	26	温州	28	温州	32	温州	28
汉口	24	以下略		以下略		以下略		以下略	

棉花 单位:公担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输出总量	比率(%)								
汉口	59	汉口	59	天津	78	宁波	80	宁波	100
沙市	20	沙市	24	宁波	17	胶州	15	以下无	
天津	15	天津	14	胶州	4	天津	3		

蛋·蛋制品 单位:元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输出总额	比率(%)								
汉口	64	汉口	59	温州	54	温州	38	天津	41
芜湖	19	芜湖	18	天津	30	天津	35	胶州	28
天津	8	天津	11	宁波	15	宁波	19	宁波	20
沙市	2	胶州	7	烟台	1	胶州	8	温州	11

桐油 单位:元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输出总额	比率(%)								
汉口	21	汉口	65	温州	68	天津	31	天津	51
万县	21	重庆	14	宁波	20	宁波	29	温州	46
重庆	8	宜昌	11	南宁	5	万县	22	以下略	

续表 3

肠衣 单位:公担

1936 年		1937 年		1938 年		1939 年		1940 年				
输出总量	13629	比率(%)	86	输出总量	9486	比率(%)	3223	输出总量	2345	比率(%)	2737	比率(%)
汉口	11762	86		汉口	7670	81		温州	689	29	天津	50
重庆	856	6		天津	783	8		宁波	669	29	宁波	33

生漆 单位:公担

1936 年		1937 年		1938 年		1939 年		1940 年				
输出总量	9395	比率(%)	90	输出总量	3393	比率(%)	3609	输出总量	511	比率(%)	835	比率(%)
汉口	8420	90		汉口	2926	86		广州	402	79	温州	94
重庆	502	5		重庆	311	9		以下略	104	20	宁波	6

煤炭 单位:公吨

1936 年		1937 年		1938 年		1939 年		1940 年				
输出总量	3148934	比率(%)	31	输出总量	2538010	比率(%)	1147591	输出总量	1358751	比率(%)	1381772	比率(%)
胶州	971460	31		秦皇岛	946726	37		秦皇岛	1100514	81	秦皇岛	81
秦皇岛	968843	31		胶州	844618	33		天津	198259	15	胶州	16
南京	503647	16		芜湖	261664	10		以下略	56821	4	天津	3

各种生丝 单位:公斤

1936 年		1937 年		1938 年		1939 年		1940 年				
输出总量	1596305	比率(%)	48	输出总量	972352	比率(%)	212431	输出总量	226692	比率(%)	317491	比率(%)
重庆	766975	48		重庆	531742	55		烟台	84383	37	烟台	40
汉口	496869	31		烟台	237714	24		宁波	72333	32	胶州	25
烟台	289215	18		汉口	128458	13		广州	66478	29	宁波	18

资料来源:郑友揆、韩启桐编:《中国国际贸易统计:1936—1940》,中国科学院1951年版。

表4 上海输出到宁波和温州的棉纱、棉布

单位:公担

棉纱			棉布		
年	宁波	温州	年	宁波	温州
1936	8519	4713	1936	38551	21418
1937	8358	3884	1937	34689	19906
1938	8236	20242	1938	28886	55861
1939	24214	28433	1939	85844	92999
1940	18273	13760	1940	69719	36078

资料来源:郑友揆、韩启桐编:《中国国际贸易统计:1936—1940》。棉布为该书表53“粗细斜纹布”、表54“市布、粗布、细布”、表55“土布”以及表56“未列品棉布”的合计。

表5 从上海到宁波和温州的物资运输额及其指数

单位:元

年	化学药剂	指数	机器类零件	指数	日用纺织制品	指数	铜铁及其制品	指数	上海批发价
1936	3360	100	3390	100	361016	100	41977	100	100.0
1937	14671	437	6962	205	500915	139	49510	118	118.6
1938	426692	12699	31949	942	1381031	383	422423	1006	142.6
1939	2044128	60837	260342	7680	5092313	1410	1233643	2939	232.0
1940	2936728	87402	453194	13369	4743044	1314	2789945	6646	505.7

资料来源:郑友揆、韩启桐编:《中国国际贸易统计:1936—1940》;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页。各项目为宁波与温州的总计。

(1) 孤岛上海与重庆国民政府支配下的地区联系起来的时候,宁波、温州位于最方便的地方,也就是说,两地背后开通公路,经过浙赣铁路可以联系粤汉、湘桂铁路,而且通过公路也可以连接柳州、贵阳、重庆。

(2) 日军禁止麻、棉花、皮革、猪鬃、蛋制品等物资从江南地区运到上海租界以后,中国方面偷偷收购这些物资,经过宁波、温州运到上海租界。反之,租界之内物资或自外国进口到上海的物资也经过这条路线被运到内地。^①

从上述(2)可以看到,宁波、温州不仅是把物资运到上海的重要港口,也是自上海租界运送物资到大后方时不可缺少的港口。表4和表5反映了自上海经过宁波、温州运到大后方的物资的情况。表4是历年自上海输出到宁波和温州的棉纱、棉布的数量统计。日中战争爆发后的输出量明显增加,可见上海租界内的棉纺织工厂为战时大后方的特需提供了支援。表5是对其他输出量较大物资的统计,以金额为单位。战时物价上涨严重,金额增加并不一定说明运出量增加。因此,表5还把各类物资交易金额的指数(把1936年的指数定为100)与上海批发价的指数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可见,运出金额的增加幅度远超过批发价增加幅度,因此,可以推知实际的交易规模也是增加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宁波、温州交易路线的全貌。即通过宁波和温州中转,把茶叶、木材、蛋制品、肠衣等运到上海;把棉纱布、化学药剂、机器等运到大后方。上述浙江商人请求政府放宽对上海租界的禁运政策,以及表2所示的申请放宽禁运物资的种类,都与这条宁波、温州交易路线有

^① 興亞院華中連絡部「寧波温州貿易ル一卜二就テ」、1939年、東洋文庫蔵。

很密切的关系。宁波商人是在上海商界有重要影响的群体,其领袖虞洽卿再三对政府要求放宽禁运也是理所当然的。

综上所述,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3月,国民政府为了长期抗战开始着手大后方经济建设;上海商人纷纷要求国民政府放宽禁运政策;宁波、温州成为重要的中转港口,国民政府也承认了这条路线与上海租界的重要性。正是这三者的结合,促成了《禁运资敌运沪审核办法》的制定。

结 语

本文主要探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上海租界政策及其变化。首先政府制定《禁运资敌物品条例》和《查禁敌货条例》,以便阻止大后方与沦陷区的贸易。这些条例简单地区分敌我,把敌方占领地及其物资都视为不利于中国。当时的上海租界是复杂的国际关系的产物,并得以维持畸形的“孤岛繁荣”。由于它的存在,国民政府无法统一其沦陷区对策。而在进入长期备战阶段后,国民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租界经济的特殊性,制定了《禁运资敌运沪审核办法》。

作为今后的课题,应进一步与日本方面的租界经济政策以及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的租界政策做比较研究,以探究重庆国民政府对租界经济的实际认知及其政策。

[作者今井就稔,日本群馬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马晓娟)

《东亚世界的裂变与近代化》问世

权赫秀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63万字,89元

权赫秀著《东亚世界的裂变与近代化》一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东亚关系史事研究,第二部分为史料中所见的东亚关系史,第三部分是东亚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史及其评论,三个部分从史事、史料、学术史及个案研究层层递进,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独立系统。作者通过对近代东亚关系史的研究,认为近代化是19世纪以来东亚世界的主旋律,而分裂与瓦解、关联与互动是东亚世界近代化的双主题变奏。从这个意义上,作者指出东亚各国的近代化不仅体现在其国内社会历史的全面与根本性变革,同时还包括东亚地区与该地区之外各国(主要是欧美列强)以及地区内各国相互关系的根本性转变,即东亚各国的近代化,实际上包括由全球到区域,然后再到国内这样一个由外而内的三重近代化过程,从而在一个旧的传统东亚世界的废墟之上,逐步形成和展开为一个新的近代东亚世界。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也正是这样一个近代东亚世界,构成了21世纪初东亚共同体愿景的历史基础。该书史料扎实、论证严密,对于从全球史、东亚史的视角理解和诠释近代中国与东亚各国各民族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徐志民)